

读《贾谊传》

徐 安 怀

《汉书·贾谊传》，是值得一读的文章。

“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曾写过一首题为《贾生》的诗：

汉有洛阳子，少年明是非。所论多感慨，自信肯依违？

死者如可作，今人谁与归？应须蹈东海，不若涕沾衣！

这首诗开篇就肯定贾谊是一个明辨是非的洛阳少年，指出他对时代敏感，不肯随波逐流、依违两可。然后讲古人有两种：一种如鲁仲连，高蹈东海，逃避现实斗争；一种如贾谊，不忘议政，关切国事，为之流涕沾衣。应该效法哪种古人？王安石断然地回答说：不能效法“蹈东海”的鲁仲连，而应该学习“涕沾衣”的贾谊。这首评价贾谊的诗，对我们读《贾谊传》很有启发作用。

在这首诗当中，“少年明是非”五个字尤其关键。“少年”，说明贾谊是一个敢于向老古董开战的新生力量。“明是非”，这是司马迁评论著名法家韩非的话。《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韩子（即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王安石是主张作诗要“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引《蔡宽夫诗话》），他使用“明是非”三个字，准确地表明了对这位汉初法家代表人物的高度赞扬。这篇谈贾谊的短文便准备用“少年明是非”来作线索，提出一些看法。

贾谊这个“明是非”的洛阳少年，并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是由著名法家李斯的弟子吴公精心培养出来的。吴公在作河南守的时候，把十八岁的贾谊收在门下学习、锻炼。这种“以吏为师”的作法，就是韩非、李斯历来的主张（《韩非子·五蠹》、《史记·秦始皇本纪》）。吴公不但培养了贾谊，而且在他到中央政府作最高司法官吏（“廷尉”）时，还把贾谊推荐给刚即位的汉文帝，让他在全国领导机构的工作中增长才干，发挥作用。吴公对贾谊的成长关系很大，而且他推荐贾谊又表现了“贤能不待次而举”（《荀子·王制》）的法家反保守精神。

刚即位的二十三岁的汉文帝刘恒，继续执行他父亲刘邦制定的法家路线。汉文帝对贾谊这个二十二岁的“洛阳少年”十分赏识，让他作了博士，又把他连升四级，破格提拔为“掌论议”的太中大夫，而且还想尽快地把他选拔到中央最高领导核心（公卿）中来。但是，汉文帝的这种作法，却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周勃、灌婴这些元老重臣，居功骄傲，论资排辈，只知道吃老本。尽管他们不读书、不学习（“绌灌无文”），却也有一套孔老二“述而不作”、“来者不如”（《论语·述而》及《子罕》）的保守、倒退理论。他们认为贾谊年轻、学问少（“年少初学”），要压迫贾谊，不赞成他掌权，把他的改革主张诬之为“纷乱诸事”。在这种形势下，汉文帝这个“谦让未皇”的年青皇帝屈服了，只好把贾谊调离他的身边。他虽然后来对贾谊的改革建议，基本上采用了，但在召见这个久离中央的青年政治家的时候，却不谈政治而问鬼神。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题为《贾生》的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是对在对待贾谊的问题上受制于保守思想的汉文帝的辛辣讽刺。

贾谊被排挤出中央领导机构，心情十分痛苦，他用楚国著名诗人屈原所创造的有民主色彩的“骚体”，写了《吊屈原赋》、《服鸟赋》等作品。把史书写成“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的司马迁，最能理解这种心情，于是让贾谊与受到反动势力打击的尊法反儒派屈原同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所写的赋，主要是揭发“闾茸尊显”的黑暗现实。虽然赋中也以“忧喜聚门，吉凶同城”来自我解遣，但长歌之哀，甚于痛哭，那正是抑郁心情的反映。虚无主义，并不是贾谊赋的本质。

备受压抑，得不到重用，并没有消磨掉贾谊这个青年的斗争意志，反而使他对国事更加关切。他在被排挤出中央以后，不止一次地上疏陈政事。从分析形势入手，指出了汉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危机，对保守复辟势力进行了愤怒的谴责。贾谊针对保守派所吹嘘的“天下已安已知”论调，非常形象地比喻说：“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他尖锐地指出：那些高唱“太平经”的人，不是装疯卖傻就是讨好卖乖，都不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正是他们在那里捂盖子，叫嚷“毋动为大”，反对改革，妄图在中庸之道的掩护下开历史倒车。贾谊坚决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表现了他反潮流、“明是非”的法家精神。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按照法家路线进行改革的主张。

这些主张主要有三点：

第一，强干弱枝，抑制诸侯，用暴力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汉王朝是在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封建国家的统一要不要维护，秦始皇所创建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要不要坚持？在这个问题上，斗争是相当尖锐激烈的。秦朝灭亡后，出身于旧贵族的项羽大搞复辟倒退，自号“西楚霸王”，裂土分封了十八个王国，妄图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汉高祖刘邦是一个大法家，他反对分裂，经过“楚汉战争”，战胜了以项羽为首的复辟势力，重新统一中国，建立了汉王朝，汉承秦制，使秦朝的郡县制继续得到推行。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了争取一些军事集团的支持，集中力量对付项羽，不得不以承认项羽所封的一些人为诸侯王作为交换条件。因此，刘邦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就面临着一场巩固统一，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结束诸侯割据的严重斗争。那些异姓诸侯王，有的本人就是六国奴隶主贵族，如韩王信、赵王张敖、闽越王无诸等；有的则是自恃有功，妄图同汉王朝分庭抗礼的野心家，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等。割据称雄的诸侯王国，成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大本营。为复辟制造舆论的反动儒生，也大批地麇集在他们门下。有的不逞之徒，更是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如蒯通游说楚王韩信，为其谋反献策；贯高、赵午鼓动赵王叛乱，策划谋杀刘邦，就是其中的突出例子。由于以异姓诸侯王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的猖狂活动，使汉王朝受到被颠覆的严重威胁。刘邦在建国后的七年当中，用了极大的力量相继粉碎了韩信、彭越等六个诸侯王的叛乱阴谋，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在平定了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后，刘邦分封了一批刘氏子弟为王，希图用亲属关系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分封这些同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注意到异姓诸侯王叛乱的教训，对他们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如规定诸侯王的太傅（高级顾问）和王国丞相必须由中央委派；没有中央的虎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等。这些办法在当时收到了把诸侯王国的部分政权和军权集中到中央的效果。但是，刘邦并没有来得及彻底解决诸侯割据的问题。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时

间过了二十多年，汉王朝与同姓诸侯王的矛盾也尖锐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同姓诸侯王根本无视刘邦的限制，他们凭借自己皇帝亲属的身分，把封国作为基地，招降纳叛，野心勃勃，伺机篡夺中央政权。汉文帝的兄弟淮南王刘长，就拚命网罗流亡的六国贵族和罪犯，给他们中有的人以“关内侯”的显赫爵位，让他们享受汉王朝“二千石”这样的高级官吏都还享受不了的丰厚俸禄，组成了一个复辟集团，妄图同匈奴族奴隶主勾结进行分裂倒退活动。他们的阴谋虽然最后被汉文帝发现，淮南王刘长也遭到了制裁，但从这里可以看到汉初在巩固中央集权制问题上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

“少年明是非”的贾谊十分重视这场斗争。他在《陈政事疏》中一开头就详尽地分析了当时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形势，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了汉王朝面临的危机。贾谊指出：现在国家的形势正害着严重的脚肿病，小腿大得象腰，指头肿得象腿。他坚定地站在维护中央集权制的郡县制的立场上，提出了用革命暴力坚决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果断措施。贾谊以屠牛坦解牛作比喻，明确指出：对待诸侯王这股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绝对不许使用“仁义恩厚”这个“人主之芒刃”，而必须采用“权势法制”这个“人主之斤斧”。就是说，对直接危害地主阶级专政的复辟势力，只能坚决镇压，决不能施“仁政”！根据当时现实，贾谊还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案，把诸侯王的封地化整为零，逐步削弱其势力，这个方案，得到汉文帝的重视和赞同，把领地最高的齐国分成六个小国，又把淮南国分成三个小国，初步得到了实行。后来又经过晁错、主父偃等人的充实完善，对进一步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起了重大作用。但是在削弱诸侯王这股复辟势力的过程中，斗争是相当尖锐的。吴、楚七国就互相勾结，用反革命的武力来抗拒，汉景帝用著名的将军周亚夫，才讨平了他们的叛乱，捍卫了汉王朝的统一。果如贾谊所说，在“醜醜之间”使用了“非斤则斧”的武器。这样作，是符合封建社会的发展要求的。因为封建社会的统一，是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密切联系着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消灭分裂割据时，“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百代都行秦政法。从此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才算真正的固定了下来。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贾谊还提出了搞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一系列主张，特别强调要培养好太子。培养太子，就是培养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接班人。这是关系着汉王朝的封建帝业是否后继有人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贾谊坚持了法家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强调环境和教育的作用。贾谊认为，夏、殷、周、秦的各代帝王，“人性不甚相远也”，之所以统治时期有长有短，是由于环境和教育造成了帝王情况的两样。贾谊指出：“夫习（经常）与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因此，他认为：“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教育）与选左右（指太子周围的人）”，“夫教得（教育得当）而左右正（端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贾谊关于对环境和教育的作用的强调，实际上是认为人的才能是后天才有的，从而否定了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所谓封建帝王及其继承人是“受命于天”以及“君权神授”的谬论。当然，贾谊这种观点是有局限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社会之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贾谊的问题也就正是如此。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贾谊能坚持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否认了“生而知之”的唯心论谬说，这是有历史进步性的。

第二，扶本抑末，重农贱商，回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在经济领域的进攻，巩固封建制度的

经济基础。连年战争，带来了西汉初年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物资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六国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除了政治上同地主阶级较量外，还凭借他们在工商业上的优势，从经济领域向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展开了猖狂进攻。他们这些工商业奴隶主，利用汉初的统一局势，出没于全国各地，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制造经济混乱；同时，他们还投靠诸侯王，控制山海之利和采矿冶金、煮盐、铸钱等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妄图操纵汉王朝的经济命脉。由于这些工商业奴隶主经济势力的恶性膨胀，他们不仅拥有众多的奴隶，而且还占有了大量的土地，以致出现土地占有“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不可胜数”的严重情况。他们利用这些人力物力，大搞经济作物，广蓄牛马，乃至“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者同乐”。他们还提出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口号（《史记·货殖列传》）。这就直接动摇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制度基础。面对着奴隶主复辟势力在经济领域的挑战，贾谊坚决主张实行法家的“上农抑末”政策，奖励农耕，增加储备，改革社会经济。在《陈政事疏》中，贾谊通过对工商业奴隶主“侈靡相竞”的腐朽生活的揭露，向封建统治者发出了警告：“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也，‘盗贼’直须时耳。”在《论积贮疏》（载《汉书·食货志》）中，贾谊更进一步揭露出这种由奴隶主复辟势力的进攻所造成的“背本而趋末”的社会现象的严重后果：“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那些对汉王朝有二心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就会乘机起来夺权。照此下去，汉王朝就只能是“大命将泛（覆灭），莫之拯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贾谊认为必须奖励生产，提倡积贮：“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枝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并且认为这是“天下之大命（命脉）”，是足食强兵，使国家“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的必由之路。这种坚持法家“耕战”政策，注重贮粮备灾的观点，是应该肯定的。同时，贾谊还针对各地诸侯王“即山铸钱，富埒（相等的意思）天子”，破坏国家经济，图谋叛乱的情况，向汉文帝上疏，揭露了“今农事弃捐（抛弃）而采铜者日繁，释（丢开）其耒耨（农具），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的严重现象，提出把铜收归国有，统一币制，由国家铸钱的措施（见《汉书·食货志》）。贾谊的这些从经济上巩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主张，是对刘邦重农抑商政策的维护和发展，在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在对外问题上，贾谊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匈奴族奴隶主的不断入侵，一直是秦汉时期的主要外患。秦始皇曾经用很大力量驱逐匈奴，筑城防边。汉初，匈奴的侵扰更有增无减，而一些诸侯王更是公开勾结匈奴，妄图利用这股侵略势力来实现他们的复辟野心。在当时，由于诸侯割据势力还很强，加之汉王朝经济力量的薄弱，还无力反攻，只能适当地防御。是积极作好反击侵略势力的准备，还是苟安现状、妥协投降？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贾谊积极主张抵抗侵略势力，在《陈政事疏》中，他一方面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猪），不搏（斗）反寇而搏菟（兔），玩细娱而不图（考虑）大患”的错误，一方面提出设置专门官职对付匈奴，以改变“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的现状。贾谊的这些主张虽不及他的后继者晁错那样完善彻底，鲁迅就曾经在《汉文学史纲要·贾谊与晁错》中指出过这一点。但是，贾谊为维护汉王朝的主权，摆脱受匈奴奴隶主牵制的地位，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是应该肯定的。后来，汉武帝打败匈奴，对汉民族的保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贾谊的这个愿望得到了实现。

贾谊是一个秦汉史的专家。他的这些主张，是在深入研究和总结秦和汉初成败得失的经

继续革命的宏伟纲领

——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杨黎华 孙海根

一九五七年六月，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宏伟纲领，是反修防修的最好教材。当前，结合斗争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这篇伟大著作，对于争取批林批孔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杂霸王”的汉家制度，就是贾谊这些主张的基本内容。尽管贾谊在保守派的排斥打击下，三十三岁就郁郁地死去了，但是他的主张，汉文帝这个法家皇帝还是实行了的。贾谊同保守派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当时的儒法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在这场斗争中，贾谊的法家进步路线战胜了儒家的复辟倒退路线，是“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的一个生动例证。这就说明了一个真理：“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他们尽管被人看不起，被人压迫，但“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在中国历史上，象贾谊这样不迷信权威、名人，敢想、敢说、敢做的青年人胜过老年人的例子多得很。这是我们应该加以总结的。

“汉有洛阳子，少年明是非”。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贾谊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他的一套理论，是在当时巩固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斗争中产生的。今天，隔贾谊生活的年代已经两千一百年，贾谊所处的封建社会也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迈入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为了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粉碎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学习一点历史，认真研究研究法家的思想和著作，看一看《汉书·贾谊传》，知道一些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以及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敢于反潮流的精神，认真总结他们的历史经验，“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